

宋词三百首



宋词导读

刘华民【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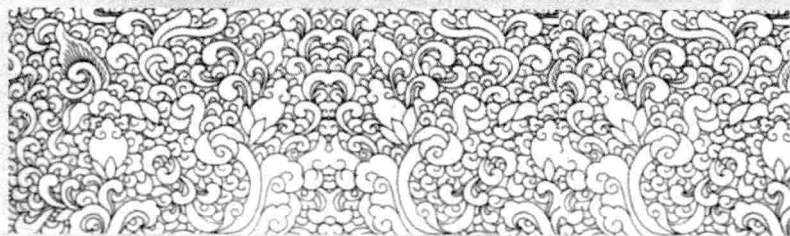
◆ 苏州大学出版社

虞山阅读丛书

刘华民【著】



词导读



◆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词导读/刘华民著.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3. 8

(虞山阅读丛书/曹培根主编)

ISBN 7-81090-141-9

I. 宋… II. 刘… III. 宋词-文学欣赏
IV.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7918 号

宋词导读

刘华民 著

责任编辑 王英志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苏州市干将东路 200 号 邮编: 215021)

常熟高专印刷厂印装

(地址: 常熟市元和路 98 号 邮编: 215500)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28(共六册) 字数 700 千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50 册

ISBN 7-81090-141-9/C · 4 定价: 84.00 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 0512-67258802

《虞山文库》总序

许 霆

虞山,以“十里青山半入城”的姿态与文化历史名城常熟融合,对常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影响巨大,并进而成为常熟的别名和常熟文化的标志。商末,周太王长子泰伯、次子仲雍让国避奔江南,建立“勾吴”,泰伯、仲雍相继成为首领。仲雍死后葬于常熟卧牛山,仲雍又名虞仲,山遂以虞为名。春秋时期的言偃生于常熟,北学中原,成为孔门七十二贤人中的“十哲之九”,晚年回归故土传道讲学,“道启东南”,“文开吴会”,死后葬于虞山东麓。仲雍和言偃,昭示了常熟文化源头的深邃和博大,标志着吴地早期文明曙光终于开启出一个区域文化的圣地。

常熟文化发展绵延不绝。南北朝昭明太子的“文选”,开始了常熟文化发展的自觉时代;自唐代陆器高中状元,常熟历史上出现过8个状元483个进士;北宋时郑时性嗜书好藏书,开了明清时代常熟出版、藏书兴盛的先河,赵琦美与脉望馆、瞿氏与铁琴铜剑楼、毛晋与汲古阁都对中国文化史作出过重大贡献;元代的黄公望,以其绘画理论和创作开创了明清山水画的新纪元;明清之际以王翬为首的“虞山画派”、以钱谦益为代表的“虞山诗派”、严澂的琴学理论和虞山琴派,还有虞山书派、虞山印派等,都达到全国一流水平,影响一时风气;近代以来,黄人的文学史论、曾朴的谴责小说等,表明常熟文化在求新变革时吐故纳新的活力。基于这种深厚

的文化底蕴,常熟当代文明,更是显示了勃勃生机。

常熟高等专科学校就坐落在人文荟萃的虞山脚下,接受着常熟深厚博大的传统文化和生生不息的现代文明的滋养。学校在与地方经济和文化的互动发展中获得不竭的创造精神,塑造崭新的主体形象,确立自身的价值目标。学校有一批人文和理工学人,更是为常熟的传统文化甘泉所浸润,以虞山的人格精神塑造品行,用致远的人生追求敬业乐教。宋人朱熹在《丹阳公祠堂记》中说言偃为人,“必当敏于闻道而不滞于形器,岂所谓南方之学,得其精华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明末龚立本纂修《常熟县志》15卷,其中《风俗志》说常熟士人“贫不负诺,富不易交,吐纳风流,意气横溢。表人胜士,千里命驾者比比,人物显晦殊途,或矜名节,或树勋庸,或敦学术”,这都揭示了常熟传统文化中独特的人格精神。这种精神是常熟文化生生不息的产物和动力,也是常熟文化走向现代文明的底蕴和财富。常熟高等专科学校的学人,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潮中,自觉地从立足的虞山福地的传统人格精神中汲取营养,坚持自强不息、敏捷好学、达美达诚的学风,在学术园地和育人园圃播种、耕耘和收获,形成了一批学术探索和教学研究成果,这是可喜可贺的。

常熟虞山,由于其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不断的文化传承,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创造的意象。正因为如此,我们愿意把这批初步的成果以“虞山文库”为名,汇集出版。我们无意创造学派,而意在宣示精神,表明当代学人对传承人文传统、创造现代文化使命的一种担当。我们衷心希望这项工作能够继续下去,能有更多的成果充实文库,承当起当代学人文化建设的重任。

2003年4月

引 言

杜甫曾经说过：“诗是吾家事。”我们则完全可以说“诗是吾国事”。我国向有“诗国”之称，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特别是宋元以前的文学史，几乎主要是诗歌史，诗歌艺术传统可谓广博深厚，源远流长。自先秦以来，数千年间，作者如云，名家辈出，他们辛勤劳动，不断创新，写下无数杰作佳篇，把诗歌艺术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些伟大的诗人和作品，就像灿烂群星，闪耀天际，照亮了中国古代文学前进的道路，成为中国古代文学艺术辉煌成就的代表和象征。时至今日，古典诗歌作品仍然以其真挚深刻的思想内容和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感染、吸引着无数的读者，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应该继承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并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诗、宋词、元曲就是“一代之文学”。

词，造端于隋唐，发展于五代，极盛于两宋，复兴于有清，绵历千年，代有作者。但是，词以宋称。如果从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看，宋词是比不上唐诗和元曲（包括戏曲）的，就是与宋代诗文相比也稍逊色。然而，在三百余年的两宋文坛上，最有创造性、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样式，莫过于词。诗至唐，有极盛难继之势，后来者很难超越，这也是宋诗不振的原因之一。词却不然，它经过隋唐五代的孕育培养，正挟其方生之气进入宋代，宛如娇花吐蕊，丽日中天，充满了活力，焕发着光彩。

现在，让我们步入这姹紫嫣红的文艺园地，尽情地欣赏它那独特的景观吧。

目 录

引 言	(1)
上 编 导读引论	
一、时代背景	(1)
二、兴盛原因	(6)
三、主要特点	(10)
四、发展轨迹	(14)
五、鉴赏方法	(23)
中 编 作品赏析	
晏 殊 [浣溪沙]	(29)
[鹊踏枝]	(30)
欧阳修 [踏莎行]	(31)
[生查子·元夕]	(33)
范仲淹 [渔家傲]	(34)
张 先 [醉落魄]	(36)
晏几道 [临江仙]	(39)
[鹧鸪天]	(40)
柳 永 [雨霖铃]	(41)
[望海潮]	(43)
苏 轼 [江城子·密州出猎]	(44)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46)
[念奴娇·赤壁怀古]	(47)

[水调歌头]	(49)
[浣溪沙]	(50)
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	(52)
秦 观[鹊桥仙·七夕]	(54)
黄庭坚[鹧鸪天]	(55)
周邦彦[瑞龙吟]	(58)
李清照[醉花阴]	(60)
[声声慢]	(62)
张元干[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	(64)
张孝祥[六州歌头]	(66)
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68)
[摸鱼儿]	(70)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	(72)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73)
姜 夔[扬州慢]	(76)
陈 亮[念奴娇·登多景楼]	(78)
文天祥[沁园春·题张许庙]	(80)

下 编 技巧举隅

一、抒情技巧	(83)
(一) 委婉曲折	(83)
(二) 含蓄蕴藉	(88)
(三) 奇思幻想	(91)
(四) 虚实相生	(93)
二、写景技巧	(95)
(一) 触景生情	(96)
(二) 设景写情	(98)
(三) 移步换景	(100)
三、咏物技巧	(103)

(一) 托物言志	(103)
(二) 不滞不离	(105)
四、结构技巧	(108)
(一) 开阖跌宕	(108)
(二) 异军突起	(111)
五、语言技巧	(114)
(一) 准确生动	(114)
(二) 点睛传神	(117)
(三) 推陈出新	(120)
六、宋词叙事现象探讨	(123)
附：阅读书目	(137)

上 编 导读引论

一、时代背景

任何文学作品,无论怎样虚构、幻想、夸张,总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宋词也同样打上了它所处时代的烙印。

“强干弱枝”,“重文轻武”,“守内虚外”,“三教并用”,是两宋君主始终奉行的“祖宗之法”,是赵宋的基本国策。

“强干弱枝”,是把权力高度集中到皇帝手里。军事上,将各州精兵升为禁军,直接由朝廷掌握,地方武装徒有虚名。禁军卫戍京城,又轮番派驻各个要塞。统兵之将无调兵之权,有调兵之权的枢密院无握兵之重。政治上,府、州、县长官由中央派员“知”之,又设“通判”监视。全国划分为若干行政区域,即“路”,相当于明清的“省”,各路分设漕司(转运)、宪司(提刑)、帅司(掌兵)、仓司(储备)四个机构,其中,漕、宪、仓三司长官负有监察州县官员的职责。中央实行“政事堂”与“枢密院”分掌军政的“二府制”,三司使(盐铁、度支、户部)则是财政主管,地位仅次于二府宰执,又设御史台和谏院,控制言路,弹劾大臣。经济上,各州赋税收入除度支给用外,“悉辇送京师”,宋代的“路”,起先就是为此(转运财赋)而设立的,后来才发展为行政区域。

“重文轻武”,主要是抬举文人,压抑武将。一是大增科举取士的人数,一次科举考试录取的名额比唐代增加几十倍,皇帝甚至亲临“殿试”。二是大办学校、书院,而且公办、民办结合。三是优

待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经济待遇都很优裕，文人掌政、文人统兵成为宋代一个重要特点，俸禄之厚，赏赐之多，前所未有。“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是宋代流行的民谣。四是大量著书、藏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资治通鉴》的编撰，都是鸿构巨制。宋太祖曾立誓碑，不杀士大夫，不杀上书言事者。苏轼在“乌台诗案”中未被砍头，实赖于此。

“守内虚外”。宋太宗曰：“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唯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着重于防止内部叛乱，防止农民起义，对外族的军事侵略，则基本采取“守势”。北宋的重兵不是把守边防的，而是驻扎在国内要害之地的，边防军常常只够站岗、放哨、巡逻，而一旦少数民族政权入侵，则退让、妥协、议和，割地、输银、纳绢。赵匡胤登基后，曾赋“日诗”曰：“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他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霸才，镇压了后周残余势力的反抗，削平了荆南、湖南两个藩镇，又先后消灭后蜀、南汉、南唐。赵光义即位，拿下北汉，吴越王归顺。不过与汉唐相比，赵宋版图最小，后晋石敬瑭出卖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仍在辽手里，西夏也在宋辽之间朝秦暮楚。但是在宋太祖兄弟心目中，外部威胁远不及藩镇割据、奴才欺主的教训深刻，他们奉行的是“先本而后末，安内以攘外”的方针。

“三教并用”。先秦是百家争鸣，两汉是独尊儒术，三国时期，魏崇老庄之说，蜀尚名法之治，吴则恪守儒学，两晋玄学占主导地位，六朝佛教大兴，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代统治者兼容并蓄，比如佛教就曾得到太宗、武后、宪宗的提倡，韩愈反对唐宪宗信佛，谏迎佛骨，被贬潮州刺史，“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唐代文人思想活跃，杜甫与儒学，李白与道家，王维与佛教，关系密切，各有所好，这种思想活跃的状况

况,对文学创作产生相当深刻的影响。赵宋君主则是有意识利用佛、道、儒三教为巩固其统治服务的。为使臣僚少“奔竞之心”、自强之志,赵匡胤一方面鼓励他们“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另一方面倡导黄老之学、佛经禅理。赵光义也经常阅读老子的《道德经》,鼓吹“治身治国,并在其内”。真宗曾利用伪造天书大搞封禅,使道家思想风靡一时。徽宗自称“道君皇帝”。与此同时,两宋理学兴起。五代时期,人伦关系受到极大破坏,社会道德水平下降,宋代许多学者想要重树人伦之极,重建儒家人文精神的宏伟殿堂,他们远绍孟轲,近承韩愈,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构筑起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并在南宋理宗时确立了自己的思想统治地位。理学以儒学为主,兼取佛、道之长,是儒、释、道交互渗透的结晶,但又保持了儒学的独立性和主导性。“援佛道入儒”是理学家的手段,“三教并用”却是统治者的文化政策。

以上两宋最高统治者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诸方面的基本国策,既收到积极的效果,更产生了负面的效应。

积极效果在于:防止将领拥兵自重,防止藩镇割据的目的是达到了。两宋三百多年间,除“苗、刘兵变”外,基本上没有出现武将跋扈、尾大不掉的现象。积极效果还在于:中国封建文化进入一个极盛的成熟阶段。宋代是中国封建文化最为发达的时代。论经学(哲学),汉宋并称,宋明相承;论文学,诗文唐宋并列,戏曲话本宋元相承;论史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郑樵的《通志》都是开创性著作,欧阳修的《新唐书》与《新五代史》、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也是学术水平很高的断代史;还有欧阳修的《集古录》、沈括的《梦溪笔谈》、洪迈的《容斋随笔》、罗大经的《鹤林玉露》等著名笔记著作,以及大量的诗话、词话(宋代知名的诗话就有139部之多);论自然科学,三大发明取得重大突破,在数学、天文学、医药学等领域,宋代也居于全球领先地位。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说:11世纪的中

国“科学与文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积极效果的第三个表现是：文化交流加强。首先是南学北渐，汉语文学是辽、金两朝文学创作的主流。其次，就宋朝内部而言，从横向看，文人在政治上党派成见虽深，但私交都不错，在文学领域能采取相互宽容的态度；从纵向看，诗人之间前后传承关系也很密切，如晏殊提拔范仲淹，欧阳修提携曾巩、王安石、三苏，苏轼门下又有四学士（黄、秦、晁、张），黄庭坚门下又产生江西诗派，其影响余绪波及几代，直至陆游、杨万里。历代文人相轻的陋习在宋代似有较大改变。文学集团、文学群体如北宋的欧、苏、梅，苏门四学士，江西诗派，南宋的四灵、江湖诗人，乃至许多诗社、词社，都在共同的文学兴趣的基础上，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对文学创作进行认真的切磋和探讨。而在同一文学群体中，又不强求一律，如欧、苏、梅三人的诗风显然不同，江西诗派“三宗”的诗作也各有特点，苏门四学士对东坡先生也不是亦步亦趋，等等。宋代文学各个领域之所以出现众多的流派和风格，从而促进文学创作的繁荣，从这里也不难窥见一些消息。

赵宋皇帝奉行“祖宗家法”的负面效应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明显，主要后果是：

1. 三冗两积。由于分化事权，互相牵制，又扩大科举取士，使宋代官僚机构叠床架屋，柳开曾以“十羊九牧”形容机构的臃肿。由于实行募兵、养兵制度，军队急剧膨胀，开支巨大。宋仁宗时蔡襄作过一个统计，朝廷百万大军的费用，竟占国家全部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朱熹也说过：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冗官、冗兵，再加上每年缴纳辽、西夏的岁币，以及朝廷大兴土木修建楼堂寺观，形成冗费。“三冗”带来“两积”：积贫，朝廷严重的财政危机，国力穷困，以及向广大人民转嫁危机造成的民贫；积弱，对外无力抵御辽、西夏的侵扰，对内不能控制农民的反抗。

2. 外患不断，民族矛盾尖锐。北宋的外患主要是辽、西夏，宋王朝无论是主动进攻还是被动防守，总的看，是屡战屡败。宋与辽

之间,有太平兴国四年(979)高粱河之败;雍熙三年(986)歧沟关之败;景德元年(1004)澶渊之盟;等等。澶渊抗辽,真宗亲征,而信心不足,只求辽军尽快撤退,最后双方以和约告终,宋应允每年向辽输银十万两,纳绢廿万匹,是虽和犹败。宋与西夏之间,面对李继迁扩张,李元昊称帝,宋王朝也显得十分软弱,同样以输银纳绢来求和。直到1127年的靖康之难,北宋亡于金。南宋的外患主要是金、元。1279年2月,元军攻陷崖山,南宋彻底灭亡。两宋是我国历史上民族矛盾最为尖锐、民族危机最为深重的年代。

3. 党争不断,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庆历新政,范仲淹与吕夷简的党争,熙宁变法,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党争,都很激烈。北宋的党争主要是变革与保守之争,南宋的党争则主要是和与战之争。绍兴和议(1141)前后,有秦桧与岳飞为代表的和战之争;隆兴和议(1164)前后,有汤思退与张浚为代表的和战之争;开禧和议(1208)前后,有史弥远与韩侂胄为代表的和战之争;亡于元蒙(1276)之际,有贾似道与文天祥为代表的和战之争。北宋党争,后来演变为无原则的派系倾轧。南宋党争,主和派始终占优势,占上风。

4. 农民起义不断,阶级矛盾尖锐。北宋有王小波、李顺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南宋有钟相、杨么起义。直到南宋末年还爆发了以秦孟四和黄从为首的农民起义。两宋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但都没有发展到全国规模,原因之一,是受到民族矛盾的制约,特别是南宋,尽管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严重存在,而广大人民却必须把斗争锋芒首先指向入侵的外敌。

两宋文学(包括宋词)就是在上述背景下产生、发展的。我们研究宋词就要把它放在这样的特定条件下进行考察、分析。例如:“三冗两积”,外患不断,党争不断,农民起义不断,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尖锐激烈,这样的社会现实在宋词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因此整体上宋词的认识价值不很高,高在审美价值;思想性不够强,强在艺术性。同时,正因为此,我们高度重视、高度评价南宋豪

放派爱国词,它是那个剑与火、血与泪的时代的最强音。

二、兴盛原因

(一) 词的起源

有人把词的起源追溯到汉乐府,甚至《诗经》,理由是汉乐府和《诗经》都能演唱,都有长短句。《诗经》以四言为主,如:《硕鼠》、《关雎》、《桃夭》、《氓》,也确有长短句,《伐檀》的句式就是参差不齐的,还有《黍离》、《式微》等。汉乐府以五言为主,如《陌上桑》、《十五从军征》、《上山采蘼芜》是通篇五言的;也确有长短句,如《战城南》、《有所思》、《东门行》等的句式也是参差不齐的。至于演唱,那么,诗与歌紧密结合、水乳交融,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大特点。原始社会没有单纯的文学独立存在,《吕氏春秋》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当时,诗、歌、舞是三位一体的。后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诗与歌都是紧密结合的。《诗经》、汉乐府确实都能演唱。问题在于,《诗经》、汉乐府是先有诗,再谱曲,词是先有曲,后填词;《诗经》、汉乐府的长短句是随意的、无规则的,词的长短句是固定的、有格律的。词的本质属性是“倚声填写”,“由乐定词”。

在我国古代,上古音乐称之为“雅乐”,中古音乐称之为“清乐”,南北朝期间,五个少数民族先后入主中原,使“胡乐”得以流传,胡乐与民间音乐相融合而产生的新的音乐称为“燕乐”(“胡夷里巷之曲”),词是配合燕乐的文学创作。燕乐有什么特点?以胡乐为主,以琵琶为主,白居易《琵琶行》:“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绿腰》。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划,四弦一声如裂帛。”形象地再现了琵琶弹奏的情景。燕乐的节奏、旋律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错综变化的,与

其配合的语言、文字必然是参差的、有长短的。

是谁最早根据燕乐填词的呢？是民间艺人，是老百姓。敦煌词的发现，是最好的证明。在瑞典人斯坦因等盗去的敦煌石室文物中，有唐写本《云谣集杂曲子》30首，还有一些写在佛教经典或残存文件背面的曲子词，共160多首，近人王重民辑为《敦煌曲子词集》。它们大多作自唐玄宗时代直至唐末五代，可能还有玄宗以前的作品。其中除5篇已经考知为温庭筠、欧阳炯、李杰所作，余皆出于无名氏之手。据宋王灼《碧鸡漫志》、后蜀何光远《鉴戒录》所说的隋代词〔河传〕、〔柳枝〕，内容写炀帝开河游幸事，很可能是隋代民歌。唐崔令钦《教坊记·曲名表》记载的324曲，依据曲名可以看出很多曲调来自民间，如〔拾麦子〕、〔渔父引〕、〔卧沙堆〕等。

总之，我们可以这样概括地说：词的产生缘乎音乐，来自民间，起于隋唐。

（二）词的兴盛

词的产生同国家的统一有关。公元589年，隋灭陈，结束了270年南北分裂的局面。政治上的统一，经济上的贯通，民族间的融合，自必带来文化上的汇流，词于是应运而生，词是南方和北方、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中国和外国、音乐和文学的水乳交融。

宋词的兴盛，从根本上讲，也同北宋统一中国有关。公元960年，赵匡胤在陈桥搞了“黄袍加身”的兵变，代周而起，建立了赵宋王朝，虽然国力不算强大，燕云十六州始终没有恢复，卧榻之侧也只好听任辽和西夏等强邻酣睡，但它总算结束了安史之乱以来二百余年的分裂割据状态，在此后的170年中，基本保持了国内的稳定，有一个相对承平的局面，这是宋词兴盛的总的基础。具体分析，可以列出以下几点：

1. 城市经济的繁荣。汴京（开封）、临安（杭州）是全国最大的都市，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

载：“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市井经纪之家。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这就是说，汴京在其颠峰阶段，几乎是不夜之城。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也可见汴京繁华的盛况。临安是南宋的首都，林升《题临安邸》诗云：“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城市繁华的盛况不亚于汴京。此外，苏州、扬州、成都、洛阳、广州、泉州等地同样很繁盛。城市经济的繁荣又总是与歌舞风流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柳永〔瑞鹧鸪〕写苏州：“吴会风流，人烟好，高下水际山头。瑶台绛阙，依约蓬丘。万井千间富庶，雄压十三州。触处青蛾画舸，红粉朱楼。”赵彦端〔鹧鸪天〕小序云：“羊城天下最号都会，风轩月馆，艳姬角妓，倍于他所，人以群仙目之。”酒馆妓院，宴饮歌舞，往往伴随城市经济的繁荣而兴旺发达。

2. 市民阶层的兴起。在商业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和基础之上，出现了两种生活面貌：士大夫的享乐生活，小市民的冶游生活。北宋时期，朝野奢侈，享乐、冶游风气极盛，士大夫、小市民都以狎妓饮酒、对酒当歌为荣。小市民爱好通俗文学，词、曲、戏剧、小说的兴起都与市民阶层的兴起有关。小市民是宋词的重要欣赏者、消费者。小市民的爱好是一种“市场需求”，对宋词起到了拉动、促进作用。如果说城市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那么，市民阶层的兴起就是宋词兴盛的群众基础。

3. 教坊新曲的流传。宋初循旧制，置教坊，来自各地的乐工都被安排在教坊里面，于是长久离析的唐代教坊旧曲渐渐被整理出来，乐工还“因旧曲创新声”，曲调日益丰富。宋徽宗崇宁年间，朝廷设立大晟府，以周邦彦为提举，会集词人乐师，讨论古音古调，并制作慢、引、近、犯等新的曲调，词乐又有较大进展。适应这些新兴曲调而创作的歌词也随之涌现，斗奇争妍。曲调的创新、丰富，是宋词兴盛的音乐基础。